



陶铸 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

权延赤



陶 铸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

权 延 赤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00号

责任编辑 沈丹英
封面设计 张志明
版式设计 任志珍
责任校对 王文霞

陶铸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

权 延 赤

*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民族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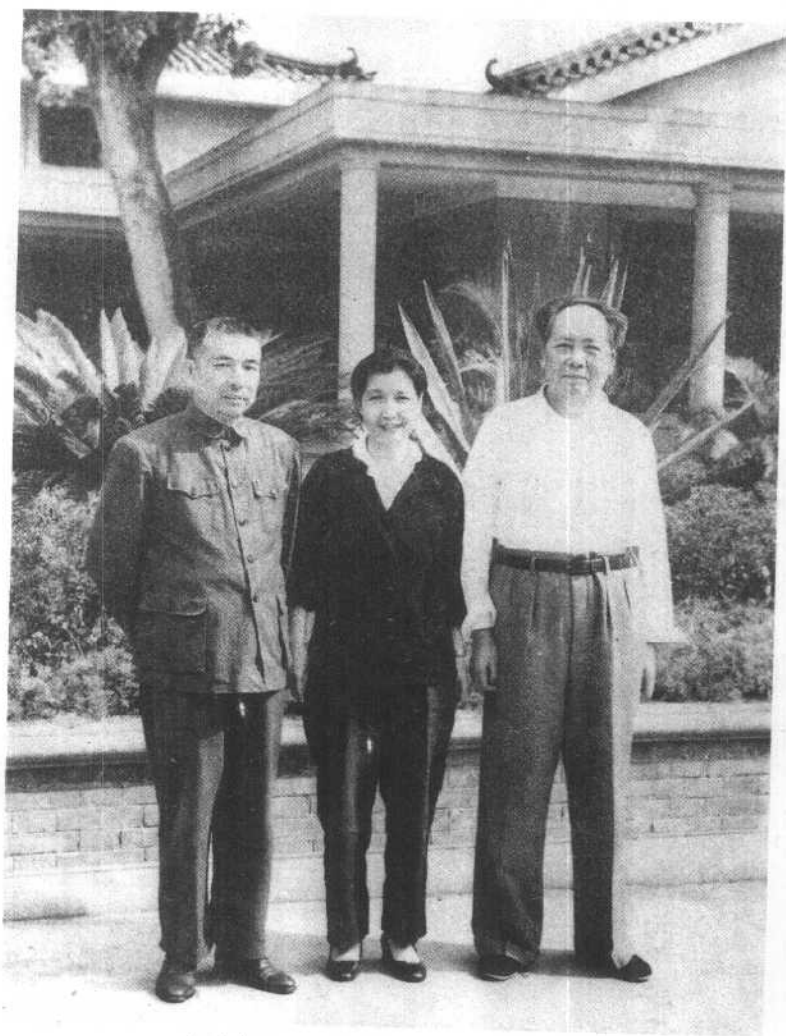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毫米 32开 8.125 印张 175千字

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0册

ISBN 7-5035-0489-7 /K·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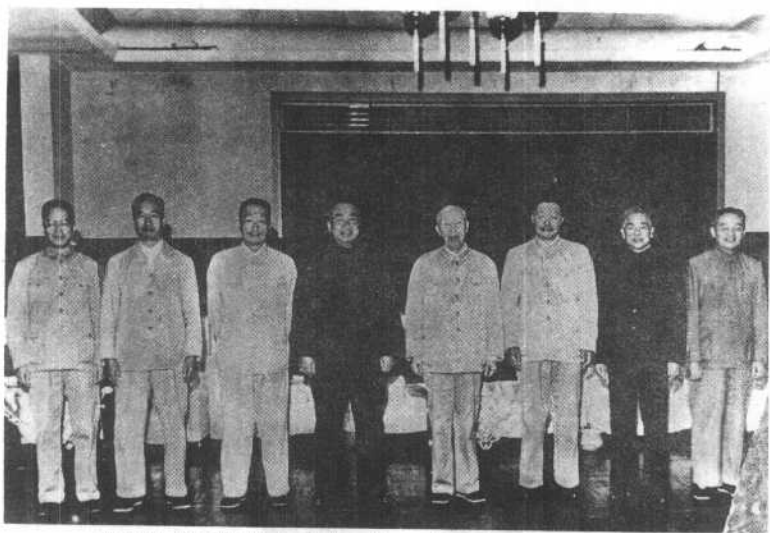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4.00 元



六十年代初，毛泽东与陶铸夫妇合影



1958年陶铸陪毛泽东参观农业加工厂



六十年代初陶铸与朱德、董必武、贺龙等在广州合影



1964年陶铸与董必武、王任重等在广州合影



1961年朱德、康克清与陶铸一家在广州

1959年陶铸一家在河内与胡志明合影



目 录

引子.....	(1)
山雨欲来.....	(4)
渊源深长.....	(17)
党内的一头牛.....	(35)
“一线”和“二线”.....	(50)
来到北京.....	(65)
一屁股坐在刘邓一边.....	(77)
江青“交底”.....	(92)
成为第四号人物.....	(109)
很不理解.....	(122)
夫妻之间.....	(134)
第一个向江青开炮.....	(154)
“保刘邓，我是对的”.....	(164)
斗争逐步升级.....	(179)
“你要被动被动再被动”.....	(193)
“林总，今天主席保了我”.....	(207)
“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”.....	(217)
“老子跟你拼了”.....	(232)
“天哭”.....	(244)
后记.....	(255)

引 子

迷信是人类本身存在的一部分。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无法穷尽，那么，迷信也不可能彻底永远地消除。我们的责任只是在不断的认识过程中不断地去消除迷信。

比如被津津乐道的人体特异功能，便是有科学也有迷信。以我个人所遇所历而言，八成以上都是迷信。我厌恶迷信，与人争吵之后也只能让它暂留身边，以“信则实，不信则虚”作为共同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调和剂。

然而，有件惊心动魄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我的知识、信仰和阅历告诉我，那传说绝对属于迷信之列。遗憾的是，我赶去之后确实亲眼目睹了。哪位读者若不相信，可以旅游去广州白云山上亲眼看看……

那是一块嶙峋的花岗岩巨石，矗立在广州白云山腹地，石上凿刻了吴作人先生手书的“松风”两个大字。碑石下葬有陶铸同志的骨灰盒。

那天傍晚，立碑的同志们正在擦汗，一股深浓的凉风飘来，像泡海水澡一样舒适。大家散开衣襟眷恋这股风，忽听得喀嚓嚓一声巨响，千山摆簸，万木鸣吟！人们惊骇地仰望天宇：黑云浪涌，眨眼间已是天暝如翳。

“来雨了！”人们拔腿而奔。只跑出十几米远，眼前蓦地掠过一道刺目白光，恍惚从繁云黑絮之中探出一条银闪闪

的手臂，五指戢张，一挥到地，正是为陶铸立碑的位置，那碑石分明进出火星来。

火熄光寂，天地漆黑一团；最多三秒钟的间隔，轰隆隆，崩雷暴裂。瞠目僵立的人中便有应声跌倒者。不是遭了雷殛，那是吓的。挣扎着爬起身再跑时，狂风骤雨已是铺天盖地飞卷而来……

暴雨整整下了一夜，立碑的同志们也一夜未睡。有两三个人议论说，确实看见闪电击中碑石。说多了，大家回忆当间情景，也都惊魂未定地肯定是那么回事，甚至有人说闻到了火石相碰才会发出的那种特殊的燃磷气味。

早晨，雨霁云散。同志们放心不下，相约重上白云山。

望见松风石，大家相偃着逡巡凑前。仔细打量，上下牙床忽然都拉开大距离，半天合不拢：嶙峋的碑石上，就在“松风”的“风”字旁，赫然一只大手印，五指戢张，入石三分有余！

这不成了陶铸显灵吗？读者不难想象碑石前这些人毛骨悚然的惨相。

事情理所当然地惊动了上面。德高望重的广州市老人林西副市长指着手印一口肯定：“是陶铸的手印！”公安部门经过技术鉴定，居然结论：“没错，是陶铸的手印！”

陶铸已经逝去十年多了啊！这些传说大大超出了我的接受能力。我不信，一番争吵之后，便买了去广州的飞机票。那是自费，憋着一口气呢。

我只能目瞪口呆地面对那块嶙峋的碑石。

我只是又听了一遍无法相信的“事实经过”。

回到北京，我就去找陶铸的女儿陶斯亮。

我们熟悉，我叫她亮亮。那原因在于她的眼睛：熠熠有光，明媚照人。

她不喜欢大惊小怪，更不喜欢叽叽喳喳；一种静谧无言的端庄神气永恒地弥漫了她的整个身姿。一位老干部曾对我说：“我见了那么多高干子女，数亮亮稳重，有教养有风度。”

稳重的亮亮对我说：“听说这件事后，我和母亲也去看过。我还用手比了比。父亲生前常和我比巴掌玩。那确是父亲的手印。要澄清事实并不难，可是，要理解那事实就不容易了，还真有点说来话长……”

后来，我又做了一些调查研究。

后来，我终于对那“陶铸显灵”有所理解。

后来，我写了这部书。

我希望，看过这部书后，读者也能多破除一些迷信，增加一些科学，对“陶铸显灵”这件事有所理解。

山雨欲来

黑色红旗车驶入广州军区大院，最后停在靠河边的一栋三层小楼前。

陶铸没等车停稳便推开了车门，他是无可改变的急性子。当他朝车门外钻出时，屁股下面的凉席垫响一声，大约又破了一些。

按规定，汽车里的沙发椅，冬天配丝绒套，夏天换凉席垫。两年前秘书报告：“陶书记，军区按上将衔给你的汽车发了藤套，换一换吧？”陶铸把手一摆：“我不管你什么上将豆瓣酱，我用旧的就行了，你给我退回去。”

这个旧的凉席垫便一直用到现在。

现在是1965年的10月下旬，广州天气依然可以穿短袖，所以凉席垫还不曾换成丝绒套。

陶铸没有看那破碎了的坐垫，脚步匆匆，神情郁郁地朝家急走。

他走步急促并非有什么要紧事赶着办，而是习惯。永远不会走慢步。一位新来的秘书曾经见他急步走来，忙迎上去问：“陶书记，什么事？”陶铸怔怔地反问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秘书说：“我见你急急地赶来……”陶铸把手一摆，叹口气：“唉，我在散步呢，你也大惊小怪。”

像以往那样，陶铸“轰轰烈烈”地进了门——门响、地

板响、痰盂响（他坐狱时患过肺病，咳痰多）、沙发响，他已经一屁股坐进沙发里。

陶铸挥挥手，随行的秘书和警卫便退出了。

妻子曾志直到这时，才走近一旁，打量几眼，问：“犯病了？”

1965年对陶铸来说也是多事之秋。在农村搞“四清”，鼻子发生问题，流血、发烧。专家怀疑是癌。

那天，他一个人面壁而立，就那么面对山墙站着，悄悄地流泪，一个小时不动身。工作人员手足失措。听说癌症就流泪，这可不像是陶铸。若是去劝说，怕他自己脸上也挂不住。想来想去还是报告曾志。曾志说：“北京和上海的专家已经会诊过了，他不是癌。他也知道这个情况。”

工作人员这才去劝陶铸：“陶书记，您……怎么了？”

陶铸泪花迷离地不回头，对着墙壁呜吟：“柯庆施去世了。在成都……63岁。”

陶铸去清远县洲心公社，那是他的一个联系点。劳累过度，开始尿血，他不当回事，后来发烧，被警卫、秘书及县委书记强行“押”回广州，仍是怀疑有癌。周恩来得知消息，亲自调集全国著名泌尿科专家为他诊断治疗，一个月仍是尿血。

贺老总来广州，居所与陶铸隔河相望。听到消息忙赶来看望陶铸。

“老陶啊，听说你有癌症？”贺龙开门见山地问，毫无忌讳。

“折腾一个多月，至今确诊不了。”

“你如果不是癌症，就要好好休息，好好吃营养品。”

贺龙抚着他那著名的两撇黑胡髭，认真地说：“如果真是癌

症，那你就拼命干吧，听我的，日子不多就抓紧干！”

这种实实在在的话也只有贺龙能说出口。

陶铸也并没全听贺龙的话。如果确诊是癌，他自会照贺龙说的去办；可是确诊不是癌，他便没听贺龙的话，没有好好休息，仍是拼命地干。好像他有什么预感，总之是“日子不多”了……

这次他不是下乡，而是去北京开会。他的气色不对头，难怪曾志要问候。

陶铸不作声，曾志便替他沏茶，绝不多问第二句。共同生活几十年，曾志了解陶铸。该说的不问也会对你说，他不想说的你多嘴多舌问几遍，他就会发火。

陶铸喝茶也是有声有色：呼呼地吹气，啞噜啞噜地吸那滚烫的茶水，咕嘟咕嘟地吞咽带响。茶水喝掉一半，他放下杯子望着曾志。

“主席在会上问大家：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，你们怎么办？”陶铸讲得很慢。

沉默很久，曾志像是自语：“中央……有事？”

又沉默片刻，陶铸说：“在小范围，吃饭的时候，主席很生气地说：有的人骑在我脖子上撒尿。”

曾志的身子不易察觉地震动一下：“什么人？”

陶铸带着思考的神情摇摇头：“主席没讲，我们也没敢问，也没敢想……”

“轰轰烈烈”的陶铸，只有和毛泽东在一起时，才能显出他的沉静温和、谦虚恭敬。如果你想知道他与毛泽东交谈时的神情，不妨想想一名好学生见到自己最敬爱的老师时是

什么样子。

陶铸就是那个好学生的样子。

毛泽东就是那个受到敬爱的老师的样子。

“你那里有多少个县？”毛泽东庄严里带着亲切和随便，问着话，手里已经去掏烟。

“110多个县。”陶铸恭敬谦和地笑着回答。

“你跑过几个县？”毛泽东递去一支烟。

“105个县。”陶铸歉意地合拢手，“主席，我不抽烟。”

“哦，你不抽烟不喝酒，只嗜好工作。”毛泽东把烟举到自己唇际：“习惯就是没有想就做出来的，比如我吸烟也递烟。”

毛泽东吸燃香烟，认真品过第一口，然后随便问道：“听说你一年有三分之二时间在下面跑？”

“主席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脱离群众。”

毛泽东点点头：“有什么新闻吧？”

毛泽东喜欢向某些领导干部问这个话，所问对象必须是有一定交往，较熟悉，并且是头脑灵活清楚，有文化有观察能力善于捕捉问题又善于表达的人。他不听你摆一二三，尤其不听你讲空道理空口号，甚至也不听你谈哲学，他虽然爱谈论哲学，但这个时候不听。他问“新闻”就是要听“故事”，要有人有事有情节，就像读通俗小说一样，越是生动曲折，越是乡土味浓，听着越高兴。

“我在花县搞四清，住在花山公社新和大队向东生产队。”陶铸深明“闲话少叙，书归正传”的道理，直接见人见事：“队长姓利，外号张飞……”

“花县是洪秀全的家乡，怎么取了燕人的外号？”毛泽

东已经起兴。

“因为他性子烈，像张飞，敢抓敢管，有魄力，许多人都怕他几分；但他自己参加生产劳动积极，肯带头，作起活来大刀阔斧，干脆利落，一般人比不了。四清他被烧得不轻，说他多占了多少多少工分，是个四不清干部。张飞白天干活，晚上挨批，大家算他的工分，张飞自己也查也算，大半夜大半夜地算。可他第二天照样很早起床，吹哨叫大家上工。该管还管，该吆喝还吆喝。谁不好好干，他一样批评。他说：我有四不清，你可以批，真查出严重，撤我的职。可我当了队长就得负起队长的责，不然更对不起乡亲们。我到了那里，见到这个张飞，接触几天后，很赞赏他。我说：你好。工分有多占，算清，但生产还抓，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！”

毛泽东频频点头：“四种干部，他是好的。”

“夏收夏种，打雷下雨。花县的雷格外大，响一声山摇地动。张飞抢着耙田，打雷也不走。突然一个落地雷，把牛击烧了，张飞也被打倒，烧得脚底冒烟。可他没死，送医院去抢救，恢复了健康。帐也算清了，没有多占什么工分。”

“张飞不能死，”毛泽东受了感动，“否则天理不公。二十三条讲四种干部，我们说前两种是多数，好的比较好的。我们说要团结两个95%，所以我们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依靠群众的大多数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。还有吧？”

“有一天下午，我跟一位大队长聊天。这个大队长有些毛病，有点四不清，爱占小便宜。但是肯工作，有干劲。他不如张飞，四清中精神有点颓丧。我叫他工作不要松劲，他说：‘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。’我笑了，说：‘泥菩萨过河是自身难保哟。现在群众把你烧一烧，烧成陶瓷菩萨就可

以过河了。’他听了，有了信心，说是这个理儿。”

“讲得好，这就是辩证法。”毛泽东听得高兴。

陶铸又讲了几件“四清”中的故事。毛泽东忽然问：“没有人认出你吗？”

陶铸摇头：“我下乡叫金云，说是科长。我这个人长得不像大干部，我们政研室的老王像大干部，人高马大，还秃了顶。老乡事后听说陶铸在他们那里住了很久，都说，知道了，就是那个秃了顶的大块头！”

毛泽东开心地笑了：“你们那里故事多。”他又讲了1962年听到的广东人讲的故事。当火车向南开时，车轮敲击钢轨的隆隆声听起来象“前途、光明，前途、光明……”可是北去的火车，听起来就像“没希望了，没希望了……”

这只是随口说的笑话吗？

十几天后，1965年11月10日，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。引起全国震动。

《海瑞罢官》是北京市副市长、明史专家吴晗1960年底写成，1961年1月在北京首次上演，受到普遍欢迎和赞扬。

可是，姚文元文章很尖刻很激烈，把剧中所写的“退田、平冤狱”同1962年的所谓“单干风”、“翻案风”联系起来，说什么“‘退田、平冤狱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”，“《海瑞罢官》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”，“是一株毒草”。

当时，有几个人能看出来这是由南向北，开始发动“文化革命”？

北京市拒绝转载上海姚文元文章。